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三〇）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九一期 ——
(二〇〇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05c)

| | |
|--------------------|-----|
| 【亡灵祭坛】中断的音符——陆洪恩之死 | 王友琴 |
| 【史海钩沉】陈里宁案材料 | |
|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十） | 周孜仁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亡灵祭坛】

中断的音符——陆洪恩之死

• 王友琴 •

陆洪恩，男，1919年生，194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1954年起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文革前一年曾因患“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1966年5月再次发病，因发病时曾有所谓“反动言论”，1966年5月28日被公安局拘捕，1968年4月27日被以“反革命罪”判决死刑枪杀。

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一个在发病时在小组会上说了一些并不严重的批评文革的话的人，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监禁两年后判处死刑枪杀。陆洪恩的遭遇浸透了“文革”的血腥和残忍。

陆洪恩出身在上海徐家汇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中，所以有“洪恩”之名。他的妻子胡国美，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任上海舞蹈学校的钢琴伴奏师。认识陆洪恩的人说他极为聪明，不但有音乐天才，还富有文采，文章写得很好。这应该是事实。因为上海交响乐团是高水准的乐团，他应该是个优秀的艺术家。

1965年1月，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的人一起到上海附近的奉贤县农村参加所谓“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此运动也被称为“四清运动”。在奉贤乡下，陆洪恩突然行为失常。他的同事只好把他绑起来送到县医院打了一针，使他镇静下来。随后，陆洪恩被送回上海。

上海交响乐团派了一辆中型汽车，该团中共支部书记隋月龙、陆洪恩妻子的弟弟胡国安等五人一起陪陆洪恩到了上海精神病医院。上海精神病医院最好的医生和陆洪恩谈话并观察之后，诊断陆洪恩患“精神分裂症”。陆洪恩在上海精神病院住院两个多月接受治疗，病情缓解后出院。他能回团上班，但不再担任指挥。

1966年春天，陆洪恩再度发病。他晚上不睡觉，总是怀疑有人要害他。他给在北京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写上万字的长信诉苦，写后又撕掉。他的妻子胡国美告诉弟弟胡国安，要他帮助把陆洪恩再次送进精神病院。胡国安是上海外语学院的俄语教师。他立即给上海交响乐团打了电话，他得到的回答是：对陆洪恩，不要送医院，不用你管。

那时在上海交响乐团发生的事情是，团里分组进行“政治学习”，讨论姚文元刚发表的文章《评“三家村”》。这篇文章发表在1966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三家村”是三个人联合使用的笔名，他们以此笔名在1961年和1962年发表了一些杂文。姚文元的文章声称要揭露这些杂文的“反动本质”，把这些杂文的内容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影射和攻击，目的是要让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对这些短文的这样的攻击，也成为发动和开展大规模的“斗争”的一条“理由”。当时的人们都只能唯唯称是，照着《人民日报》的说法发言。但是陆洪恩在小组会上对姚文元文章表示了不同看法。团里的人和他辩论。他亢奋起来，滔滔不绝地陈述别人都不敢说的看法。当有人驳斥他的看法，说他和苏联修正主义头目赫鲁晓夫一样。在这种刺激下，陆洪恩说，你们说我是，我就是，并且说了“赫鲁晓夫万岁”。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他在1956年开始揭露斯大林时代的残酷迫害并给受害者平反。虽然赫鲁晓夫只是部份地否定了斯大林，他被毛泽东当作“修正主义”的头目抨击，并且在文革前夕遭到中共越来越凶狠的咒骂。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时，也一直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陆洪恩是有精神病的人，在开会辩论时，在对峙的情况下，陆洪恩越说越激烈。因为陆洪恩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并且负气喊了“赫鲁晓夫万岁”，这就被当作了“反革命事件”。结果，陆洪恩没有被送进精神病院，而是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捉进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现在回观往事，我们可以认为，陆洪恩对姚文元文章的不满，是相当理性的思考的结果。实际上，当时也有不少人对于姚文元文章的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的方式非常反感，但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人们都知道把真话说出来会有严重后果，或者说在文革前和文革刚刚开始时，一般人已经被训练成不形成或者不表达自己的独立的想法的顺从者，没有人敢在公众场合说出自己和权力当局有违逆的想法。陆洪恩精神失常，所以不能懂得必须躲避锋头保护自己，他径自把他的看法说了出来。他不能意识到他犯了大忌，将遭大祸。

在拘留所里，生活条件不好。陆洪恩得不到烟抽，而他是个吸烟很多的人。最不人道的是，陆洪恩从1965年第一次入精神病院之后，一直服用有镇静作用的氯丙嗪，被公安局拘留以后被停了药，他的病就越来越严重。

据说，陆洪恩在关押中见到红色的东西就试图破坏，那时候到处都是红色的标语、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本等东西。这种对色彩的狂躁反应本来是精神不正常的表现，然而，由于红色被当作“革命”的象征，所以陆洪恩对红色的反感也变成了他的“反革命罪行”。

另外，据说他在关押中呼喊了“反动口号”，和毛泽东有关。具体喊了什么，不详。在文革中，大力追查所谓“反动言论”、“反动标语”和“反动口号”等等，但是被“揭发”出来并且被用来定罪的这类材料，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作“防扩散材料”，都不予公布，也就是说，除了少数“专案组”的人以外，不准一般群众知道。不准“扩散”的目的之一是怕引起听众共鸣。但是，这些没有明确核实过的材料却可以被用来判处重刑甚至死刑。

陆洪恩1966年被“拘留”，在拘留所被关了一年后，在1967年转为“逮捕”。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违法的，但是文革时代，司法部门就不遵守法律。在“革命”的名义下，抓人斗人，都是可以受到赞扬和奖赏的“革命行动”。

在陆洪恩被关押期间，他曾被押回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交响乐团的“斗争会”上，遭到野蛮的殴打和折磨。现在的人们可能不能想象在交响乐团这样的地方，怎么能殴打折磨侮辱乐团里的成员。但是在文革时代，交响乐团不排练也不演出，全部时间用来进行文革，作出了大量野蛮残酷的事情，而且，根本不被当作什么值得惊讶的特别的事情。在“斗争会”上打人甚至打死人，在上海，1966年8月之后一直在发生。就在上海交响乐团，1967年1月31日，已经是陆洪恩被拘捕半年多之后，在上海湖南路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里，在全体工作人员面前，乐团的钢琴演奏家顾圣婴被拖到排练大厅的舞台上拳打脚踢。她被男人狠打耳光，被罚跪请罪。在这场“斗争会”之后，当天晚上，顾圣婴和她的母亲、弟弟一起在家中开煤气自杀。顾圣婴是当时中国最好的钢琴演奏家之一，1937年生，1954年入上海交响乐团，曾经在国际钢琴比赛上获奖。顾圣婴死亡的时候，30岁。

更残忍的事情接着发生。1967年1月，在上海发生了所谓“一月革命”，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打倒”了原来的中共上海市委，建立了文革的新的权力机构。毛泽东决定把这种新的权力机构改名叫做“革命委员会”，而不再象原来那样叫做“人民政府”。张春桥和姚文元担任“上海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他们就是后来被叫做“四人帮”的人中间的两个，在文革中掌有极大的权力。“革命委员会”实行毛泽东所说的“一元化领导”，不但有行政大权，而且有判处死刑的大权。

1968年4月27日，上海“革命委员会”属下的“上海市公检法领导机关”在上海市中心的“文化广场”，当时已经被改名叫做“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对陆洪恩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除了陆洪恩，还有另外6人被同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6个人的名字是：柳有新，彭振邦，陈霖，尤咏仁，杨望义，张鹏宏。因为陆洪恩是交响乐团指挥，是公众中的知名人物，所以笔者得以听说他的死亡，并且设法调查到他的有关情况。和陆洪恩一起被判处死刑的另外6个人，笔者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为何被判死刑，希望读者中有知情者能告知。

据上海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报导，宣判陆洪恩等7人死刑的大会的全名，叫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罪犯公判大会”。这种“公判大会”在文革时代是各地常用的方式。这种“公判大会”没有法官，没有检察官，也没有辩护律师，也没有陪审员。这不是一个“判决”的程序，而是要公众接受这个判决以及其中包涵的信号的方式。一万人参加这个“公判大会”，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判决有参与决定权，而是去表示拥护这个判决，去接受这种残酷的“专政”。这样一种形式，是从1950年代开始实行的。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对法律的极大破坏。不幸的是，这种形式在文革中得到了登峰造极的普遍使用。而且，这种概念深深毒化了人们关于法律和正义的意识。即使在文革后，很多人说到这样的“公审大会”，也仅仅强调在这样的会上被判处了死刑的人们是无罪的，不是“反革命”，但是不曾指明这样的“公判大会”本身是违法的，这是文革领导者的犯罪行为。

《解放日报》的同一文章还报导了“本市公检法领导机关负责人”在大会上的发言：“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公然跳出来，疯狂地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地攻击、诬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诬蔑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对这一小撮积极敌人，我们坚决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从这个讲话中可以清楚看出，作为判处7个人死刑的理论上的根据，是些什么。批评毛泽东和林彪，当时就可以作死刑判决的依据。这是前所未有的酷法。至于这是否事实，又在另一层面上形成严重的问题。因为对陆洪恩的行为，根本没有允许为他辩护，也不允许把他说话的上下文和情景以及意思解释清楚，更重要的是，根本不考虑他精神失常的因素。

《解放日报》的报导还说：“大会宣判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柳友新等七名现行反革命份子当即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在文革前，判处死刑，准许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虽然据说最高人民法院从来没有推翻过下面的判决，但是至少在形式上需要这样作。这种宣布判决、立即枪毙的做法，在法制史上是空前的。判决不是正常的判决，死刑执行也不是正常的死刑执行。对这样的方式，应该提出起诉，进行审判。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可能进行这种审判。

“文化革命广场”的容量大概是一万人。上海当局除了召集满广场的人来开“公判大会”之外，还组织各个单位的人收看电视上的“公判大会”实况转播。当时的各个单位，业务工作可以随时扔下，参加这样的文革活动，而学校本来就是在全面停课之中。当时电视很不普及，私人电视更是少见。上海是当代中国技术最发达的地方，不幸，当时的技术不是被用来造福于普通人，而是用来为文革服务。在上海，1967年，举行了几十场电视台上的“斗争会”，可以算是在迫害人方面运用了别处没有用的“高技术”。陆洪恩被判死刑的公判大会，不但有现场的一万多人参加，而且通过电视转播宣判大会的现场实况。当电视节目中没有交响乐也没有故事片播放的时候，电视技术被用来播放判处乐团指挥死刑的场面。

电视观众在屏幕上看到，陆洪恩被五花大绑，健康状况极坏，两年的监禁，把他折磨得完全不象一个49岁的人。以恶劣的生活条件虐待被关押者，这本身是一种犯罪，但是当时被公开作为警告和威胁普通人民的手法。

《解放日报》的报导还说：大会宣判后，七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这时场内场外的革命群众长时间的高呼口号，无不拍手称快”。“革命群众”对枪毙陆洪恩等人“拍手称快”，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写实的。文革煽动和鼓励人们使用暴力，相当一些人的恶意在革命的名义下释放出来，对于杀死他人，不但没有同情，还欢欣鼓舞，积极参与，甚至以害人牟利。文革杀人，到1968年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多手段比判处死刑还残酷。即使是不参加直接杀人的人，在1968年也变得相当麻木而缺乏同情心。再没有比文革在摧毁中国人的道德方面作得更彻底的了。当时的很多人，冷漠，也卑劣，即在狼的面前像羊，在羊的面前像狼。在陆洪恩这样的待宰的羊的面前，恻隐之心并没有多少。另一方面，解放日报这样报导也是夸大的，因为良心尚存的人们仍然是有的。报纸没有作问卷调查，怎么能说人人赞同，“无不拍手称快”。这种方式的用意之一是造成人人如此的假象，对那些心里不服的人们造成心理威胁，从而迫使人人都这样作。这种报导方式，就像“群众公审大会”方式一样，用“多数”来恐吓和压服别人，是非常恶劣的宣传手法和征服手段。

枪决陆洪恩等人的布告贴在上海街头。看到过布告的人说，布告上有他们的照片，模糊不清，更使人觉得恐怖，因为看了让人觉得你甚至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就会被枪毙。

陆洪恩被判死刑的时候，陆洪恩妻子的弟弟胡国安，在上海外语学院被对立派的“群众组

织”抓去关起来。他们强迫他“交代”和陆洪恩的关系等等，试图抓到他在对待陆洪恩问题方面有什么“划不清界限”的“错误”，可以整他。只因胡国安一贯行事小心谨慎，总算没有被抓住什么把柄，所以被关了两天后被释放了。

陆洪恩被枪决后，有公检法方面的代表到陆家通知陆洪恩的妻子胡国美，并向其索取打死陆洪恩所用的子弹费。

据传，对陆洪恩判死刑，张春桥，“四人帮”之一，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说过：“陆洪恩不是精神病，是反革命。他喊赫鲁晓夫万岁，为什么不喊毛主席万岁？” 笔者无法看到当时的会议记录，无法知道这里引用的这段话是否准确。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在上海判处死刑，一定经过张春桥和新建立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的最后批准。

上海“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曾是文化界的人，他们都应该是听过陆洪恩指挥的音乐或者至少知道他作为音乐指挥的名声的。当他们挥笔批准陆洪恩的死刑判决的时候，他们心里充斥的是“革命”的狂热还是残忍的快意！

在文革时代，陆洪恩不是仅有的例子，即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说了当时会被当成“反革命罪”的话，被判重刑甚至被判死刑。对这样的人的判刑甚至枪毙，至少涉及了几个层面上的非法。

首先，他们精神失常，和文革的恐怖气氛，和遭到残酷的“斗争”，包括殴打侮辱等等非人待遇有关。陆洪恩在文革前就有精神病，但是，如果不遭受文革时代的迫害，他的精神病不会变得那么严重，而且是可能治愈的。从当时一批“斗争对象”被活活打死的事实，可以知道那时的暴力程度有多么严重。在北京，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运动掀起时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上海，总的来说，被活活打死的人数没有北京多。上海在文革中被打死和被“斗争”后自杀的总人数，根据文革后的1984年上海对文革案件的复查，有11,510人。其中有一些人被活活打死，一些在饱受折磨和虐待后自杀，因此在各个局部，上海可能和北京一样残酷。在遭到残酷的“斗争”以后，他们未经法律审判程序就被关进监狱。在他们被关进监狱之后的生活环境，他们自己当然已经无法说出。和他们一起被关押但是活着出来的人后来说出了当时监狱里的殴打、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心理折磨。这种通过“革命群众”之手或“专政机关”施行的暴力迫害是非法的。

第二，他们当时的言论是在已经精神失常的情况下发出的。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对于精神病人，不仅他们的言论，就是他们的行为，甚至类似暴力攻击和杀人这样的极端行为，都不能作为量刑和判罪的依据。因为精神病人在发病的时候，无法为他们的言论和行为负责。另外，只有专业医生有权作精神病鉴定。在正常的司法程序中，一个嫌疑犯，即使他没有精神病史，只要他的律师、辩护人或家属，提出他有精神病方面的问题，法庭都必须使他得到精神病专家的检查，获得专业医生的结论。对于有精神病史的嫌犯，法庭必须首先考虑这个因素。而陆洪恩一案非常明显，因为他因“精神分裂”住院治疗的经历，还是仅仅一年以前的事情，直至“案发”，他还在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病历具在，无可怀疑，否认他的病情因素，不是因为不知道，而是知道了故意不承认。

第三，陆洪恩这样的人，虽然精神不正常，但是既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打架毁物，不对公众造成危害。定他们罪的“理由”，只是他们说过的一些话。既然当时的宪法上写有公民有“言论自由”，言论就不应该成为定罪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定死罪的理由。即使这些话是精神正常的人说的，也不应该是罪，更不应该是死罪。但是，在文革中，这类言论当时被称作“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公安机关内部还将之简称为“恶攻”。“恶攻”是当时最大的罪之一。

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67年1月13日联名发出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一般被简称为“公安六条”）第二条说“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但是他们没有给出定义，什么样的言论是“攻击诬蔑”。不小心弄脏了毛或林的照片，开个玩笑，都可以成为“恶攻”，成为“现行反革命”。

另外，尽管这种“恶攻”言论可能并不是向公众作出的（陆洪恩在这方面是个特例，但是这是因为他精神不正常。），也没有任何录音或文字记录可作证据，只要有两个人揭发（这两个人可能受到了包括拷打在内的威胁或者利诱），就可以坐实。然后这种“恶攻”就可以成为重罪甚至死刑罪。如果作自我辩护，那就会当作“抗拒从严”的例子受到更残酷的处罚。“恶攻”罪名在文革中害了千千万万的人。

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酷法，却在文革中一直被认为理所当然。另外，各地都会有一些想通过“挖掘阶级敌人”来立功的人，拚命想找出这种“恶攻”的话和证据，来把一些人圈进“反革命”的范围。而被“恶攻”绳子套上脖颈的人，如果他们神志还清楚，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只有拚命声明自己没有这样说过或者想过这些话，却不能质疑这一定罪原则。直到1979年的春天，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有专家指出，他们查找资料，发现希特勒时代的规定，是“侮辱元首者，拘留两星期”。文革时代，对领袖远未到“侮辱”程度，就可能被枪毙。人们听了才意识到文革的规则之残酷程度。在历史上，大权在握的统治者杀害人不是少见的现象，但是，他们杀人，常常找一些“理由”。这些理由一般是“谋反”“贪污”“危害国家安全”。这些“理由”可能不是他们真心想的理由，而是他们找的借口，这种指控也可能根本不是事实而是假造的，但是，能够放到桌面上来的，还是需要一些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文革时代，“中共中央”，也就是毛泽东和林彪自己，发出指令说“攻击诬蔑”他们两人就是有罪，是重罪，这样的酷法，史无前例。只是文革十年反复贯彻这样的信条，以致人们都有了“从来如此”的印象。

第四，确定对陆洪恩等人处以死刑，没有经过正常法律程序，其中重要的是辩护和上诉。如果允许辩护，即使可以把说赫鲁晓夫好话当作判“反革命罪”的根据，至少还可以请上海精神病医院的医生为他的病情出庭作证。另外，文革前判处死刑，被告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如果最高法院驳回，死刑才得以执行。文革中改变了这一制度，死刑批准权到了各省和直辖市，由各省和直辖市在文革中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批准死刑。根据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理论，检察院、法院、公安局三位一体，死刑由共产党党委决定。在上海，1967年的“一月革命”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接着就枪杀了陆洪恩和林昭，还有很多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姓名的人。有人记得，1969年10月为“庆祝国庆”，上海有六十多人被枪毙了。张志新是在1975年4月由中共辽宁省委常委会决定判处死刑枪毙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其中起了最后决定的作用。

1981年，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为“四人帮”中的两个，受到了审判，张春桥被判处无期徒刑，姚文元被判处了18年徒刑。能够用法律程序而不是谋杀或秘密囚禁来解决共产党高层的矛盾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审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时候，他们明明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最得力的帮手，他们的最大的罪名竟然是“反对毛主席”，他们杀害陆洪恩以及类似的普通人民的罪行，却没有被得到起诉。

陆洪恩本来是一个在乐池里把美好的音乐带给人们的人。交响乐曾经通过他手中的指挥棒流向爱音乐的人们。他不幸患精神病，如能得到医疗，病情可能缓解甚至痊愈。但是，在1966年，文革开始的第一年，他被逮捕，在文革的第三年，他被杀死了。

胡国美和陆洪恩的儿子叫陆于为，父亲被杀害时他18岁。他被送去新疆劳动11年，直到1979年才返回上海居住和工作。

陆洪恩死后，他的妻子胡国美生活在忧郁和压抑中，现在已经去世。

~~~~~

## 【史海钩沉】

### 陈里宁案材料

〔说明：在以思想言论定罪的制度下，精神病患者，因为其异于常人的思想言行，常有被定为犯罪的危险。上文中的陆洪恩就是一个惨痛的例子。但是，这样的悲剧并不始于文革。陈里宁在文革前因持有怀疑、反对刘少奇等人的思想言论，辗转于精神病医院和专政机关之间。文革的风云变幻使得他原来的“反动言论”成了先知先觉的“革命言论”，他本人也从“反革命分子”一夜间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一时间被誉为“新时代的狂人”，他的日记被冠以《狂人日记》的标题在群众组织的小报上广为刊载，他的事迹被编成剧本在京、津等地演出。后来，由于有人揭发陈里宁也有涂改毛泽东及马列著作的行为，他被再次打成“反革命”。这里收集到的材料摘自1967年2月陈里宁被“平反”时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编印的部份材料。——编者〕

#### ◇ 清华大学红教工宣传组发表“陈里宁日记”的说明

这里，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由于怀疑和批判刘少奇，因而遭到刘邓反动路线和反革命分子罗瑞卿之流的残酷的政治迫害的情况。

共产党员陈里宁同志，现年32岁。他初中毕业后参加革命工作，原职湘潭市人委资料员。1960年在参加××公路工程中，获“劳动模范”奖状；1962年获市委机关“优秀党员”奖状。

自1957年起，他从刘少奇的著作及其言行中，逐步看出了刘少奇的问题。他感到问题很大，自称这个问题“把我急疯了”、“使我的神经到了错乱了的地步”、“害怕刘主席反对毛主席”。他把自己对刘少奇的批判在同志间议论，但遭到了“批判”，精神受到极大的压抑、刺激和摧残，并被当作精神病人，在1962年4月至1964年12月间，三次关入湖南精神病院。可是他对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一直进行着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每次出院之后，他仍继续“琢磨”着刘少奇的问题。1964年10月间，他“忍不住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不怕死，利用时间，写了三十多封信扩大影响，并把一切行李拿回家，准备不怕死大斗一场。”但是，他给毛主席、林彪同志、康生同志等首长的信，却落入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成了他“反革命”的“罪证”。

1965年1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刘少奇和他是什么关系？！）派人将陈里宁从精神病院“秘密逮捕”入狱。当时，迫害他的“凶手”丧心病狂地威胁陈里宁说：“毛主席年岁大了，只挂个名了，真有权的是刘主席，你反对他是自取灭亡……。”入狱后，他被连续审讯了七个月之久。在狱中，他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不准看书、看报和写信。为了与外界取得联系，他想出了唯一的办法——装疯。1966年10月底，他第四次被送入北京安定医院（即现在的红卫医院），这是他第七次被关入精神病院。

这个“精神病人”，无论是在狱中或是在病院中，对刘少奇的问题，一直做着十分正确的批判，对党对毛主席无比热爱。他经过了绝食斗争，才获得了看书、看报的权利。但他从病院中

送出的信件，却一直被扣压在“病历”中，成了他新的“罪证”和“病证”。直到去年十二月底和今年一月三日，主管陈案的人还两次对他扬言说等他病好了就送他去劳改，并不准他与红卫兵接触。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波涛，早就震撼了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派统治着的害人医院，他第四次进入安定医院的主管大夫从陈里宁的言行及“病历”中看出了“问题”，文化大革命启发了这位共青团员的政治责任感。她看清了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迫害，她否定了以前好些反动权威对“病人”的诊断，冒着风险，帮陈里宁把信件发出去了！

1966年12月19日，红卫医院的革命造反派，联合了清华大学井冈山、清华大学红教工和其他院校的革命师生，造了医院的反；接着于今年一月六日，又造了与陈里宁有关的某上级单位的反，把有关材料直接汇报给中央文革小组。革命造反派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陈里宁等“病人”被解放了，造反行动的第一个回合胜利了！

下面，我们把已搜集到的有关陈里宁的部份材料，分类按日期先后编纂起来。（材料原文有作删节的，均用“……”表示，原文中的用词用字，均按原来面貌，未加修改，阅读时请注意。）这些材料，是对刘邓路线的重要揭露和迎头痛击。它把刘少奇剥得体无完肤，把王光美打得狗血喷头，也是对那些精神病学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有力审判和“诊断”！

编入的材料极不完全。希望同志们读后多给我们提出意见！

清华大学红教工宣传组 1967年1月11日

◇ 第一部份：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向刘少奇这个“庞然大物”开炮！——陈里宁日记和别人对他的“揭发”

§ 日记：

1963年4月23日

在人们把我推上吉普车（送去精神病院）时，我向××同志说了一遍，我是故意说的：我要给×××（机关领导）一粒象征性的子弹，表明我将以毛泽东思想来打击敌人，作为一颗子弹一样。

1963年6月21日（这一天，陈里宁第一次出院）

我没什么病。我可以清楚地合逻辑地想起当初的情况……。

1964年9月14日夜

韶山，花明楼，两者真有天地之别。毛主席爱的是山，气势磅礴；这个爱搞什么楼，真是与毛主席唱对台戏！

1964年11月2日夜

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把好得很说成糟得很。他也大谈其政治、阶级斗争，等等。实质内容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那末这种只不过象红薯一样，红皮白心。可怕的是：这种人党内



混入很多，发号施令，不可一世。我看就糟了。还是要彻底清理一番，照毛主席说的那样做。

大干部想特殊，以为他就是救世主，他没有想到：他作一个报告，中间的数字句子，都是集体的创作，没有群众的劳动，他不可能作报告。我劝他谦虚一点……。

有些人喜欢把问题复杂化，迷惑人的注意，接触到原则问题，就息事宁人，实质就是为反动派效劳。他们被阶级的有色眼镜迷住了眼睛，把真理当毒草，似乎只有某人说的就对，毛主席说的就不对。他们口头拥护毛主席，实质反对毛主席。

林彪作风很可取。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见有益无害的事情就干，战备观念强，随时准备打仗，这就是无声的命令。

1964年11月5日

不要把那些资产阶级人物当宝贝，他们有些人顽固得很，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仍是死要面子，名利都要……。

有的人专干坏事，但是他到处吹嘘他就是党，代表毛主席，真是怪事。

§ 别人对陈里宁的“揭发”材料：

第一篇：《陈里宁的反动言论之一二》

一、说刘主席是大流氓、政治骗子：“自己本来有爱人，离了婚，又找一个年轻的学生王光美做爱人，带着游马路，还要游到外国去。”“……照他（指刘少奇）的说法，好像毛主席、周总理、林彪同志的被人民群众崇敬，都是他搞个人崇拜搞起来的。”“安源煤矿的大罢工，写成是他个人的劳动，实际上，工人们的死伤很大。”

二、说刘主席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八大《政治报告》是错误百出，并将该书乱加批语：“我看了一下，这两本书至少有五十个错误：《论共产党员修养》第一句话……显然是荒谬的。……他教育党员修养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政治报告》（1956年）中，他宣布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消灭了，……等等，这是否认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是与毛主席的学说唱对台戏。其实哪里消灭了。”还在该书批着：“既不可能，又不需要”、“此处猫屁不通”等等。

三、说苦日子都是刘主席带来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哪里是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都是他搞的不好带来的。”

四、说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是假的：“她作的报告都是假的，我听了几句，觉得冒（湖南话，没有）一点味道，讲了一天，结果是自己在农村里没有吃到饭。是她没有找中地方，象妖精一样，我在河东河西都走过，农民是很欢迎的，没有吃不到一餐饭，就要搞社会主义教育。”

五、说×书记是婊子养的：10月4日上午在办公室他对我说：“……×书记这个婊子养的，到×××厂去工作，看见一个女学徒长得漂亮，就说她看问题水平高，将她调来市工作……”

## 第二篇：《陈里宁的言论非常反动》

陈里宁在群众中对刘少奇主席、×书记（机关领导）进行了恶毒的谩骂和攻击，他在10月2日说：“我就不拥护刘少奇，就是要反对他……他写了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有50余个问题，我要和他进行辩论。”又说：“我不怕，要杀就杀……宪法上有规定，党章上也有规定，党员对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直至中央有意见，有权利提，就要提。要杀，你们就杀，我有一只笔。”“……他要杀我，我倒不怕……，我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陈里宁经常说：“我姓陈，是东边挂锄头，他锄禾苗，我要锄毒草。”“你要不相信，我说的是有根据的，将来历史也会作结论的。”

××× 1964年10月4日

## 第三篇：《检举陈里宁的反动言行》

……十月一日晚上十一点钟，交际处前坪的电影结束了，这时陈在桌旁看书，见我进了房，忙说：“……刘少奇过去自己有妻室儿女，丢了不要，而不知从哪个学校里找了个30多岁的女学生，转山游马路，带了出国，唤做夫人，还拍成电影，真是当了婊子还要起牌坊。他是大骗子，大流氓，到处招摇撞骗。有的人还选他当人民代表，我是坚决反对他。我姓陈，我东边挂锄头，到处去挖。……”

陈说到这里开始上床睡觉，我插嘴问道：“你刚说的这些向组织谈过吗？”他说：“我谈一点，他们就讽刺我，我懒得说。……今晚我又写信给中央，我不信鬼，说不得硬要说。”此刻，陈从床上爬起来，急忙翻阅《宪法》和《党章》，并说“……我是个共产党员，还怕什么！我拿了这本宪法和党章可以走遍全国。”我提出要他把《论共产党员修养》那本书给我看看，他不但答应供书，还将写好的信递给我看。我估计，他是先看书，后写信的，书上批语和信上写的全部系谩骂刘主席的一大堆话。我说：“你这情况应找组织上的同志谈谈。”他冒作声。第二天清晨，我便把陈的反动透顶的言行向党支书×××作了口头汇报。

十月三日晚上，陈很生气地说：“我就是恨透那些人，造了我一些谣，说我想爱人，疯了，隐瞒家庭情况。×××假名送我去长沙治疗，结果他在宾馆住了十几天，他和市委书记×××把手枪扳起来要杀我……近来也好，有人跟随我，监视我，我写了信，别人告了密，被拿去了。我向党小组长谈谈个人思想，又说我是会后议论，这真叫我只有死路，冒得路走。”

上述两晚陈的反动言行，我认为不能作为是疯子的表现，陈并不怎么疯，从他恶毒的谩骂刘少奇主席，要以笔去杀革命同志，看来是有极其反动的政治思想作指导的，是有意的在我国庆节的夜晚放肆发泄阶级仇恨。

材料检举人 教育局干部×× 1964.10.4

## ◇ 第二部份：用生命来保卫党！——陈里宁信件

下面的信，有的是陈里宁在湖南时所写，从时间上看，多是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写的。但他在1964年10月冒死所写的给首长的30多封信，大部份未搜集到。信的另一部份是他在红卫医院中写的，它们（除了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外）都被扣压在“病历”中，没有寄出。

§ 1964年10月2日给《新湖南报》的两封信

第一封：

中国有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代言人，一再修改他的唱本，向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说教：“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共产党员深深知道：有志不在年高。新中国青少年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应当做党的孩子，入党入团那更不用说了。伟大的毛主席在青年时代就写出了“天不怕，地不怕，鬼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等豪言壮语。抗日战争时期、朝鲜战争时期就有英雄小八路，少年游击队。既然如此，为什么此人念念不忘孔子的说教呢，文章并不是没有修改的机会呀！

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封建说教：“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很苦的锻炼过程……”

这段话证明：此人连历史都不懂。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斗争史，孟子所指的那些担任‘大任’的人物，可惜都不是什么锻炼。他们锻炼的是如何杀人民，剥削压迫人民的本事，那些锻炼方法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

……如此等等。这种既不加批判、不加分析、盲目说教的人，正是“伟大的”刘少奇主席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告诉我们的。“既然如此，我们还要去……学习那些所谓圣贤之道干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升官发财……”这一段话用在这里，岂不是十分恰当的帽子吗！……

第二封：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是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应当象雷锋同志那样做。

但是奇怪的是：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人，写了一本著名的书，流行国内外，甚嚣尘上。书上说的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呢？人们为了要生活，就必须……。”

按照这种奇谈怪论，岂不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以及陈立夫之流的“唯生论”等论调，同出一辙吗！……

我们再看此书的结尾吧。

“……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上进行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精练的模范党员和干部。”

由此可见，他说半天是劝共产党党员当模范。我们知道：模范的称号，不是共产党员修养的目的。共产党员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毛主席也一再教导我们这样做。退一万步说：模范党员和干部，并不是某人去封的，也不是自封的，共产党员不应当在思想改造中抱着这样一个目的……。

为什么此人如此放肆呢？还不是廿多年前刘少奇主席英明的预见吗：“……人的言论行动，都是有人的思想意识来作指导的。而人的思想意识又常常和他的世界观分不开的。”

这真是一个极端严重的原则问题……。

§ 1964年10月6日给江麓机械厂党委信，揭发刘少奇霸占国家物资为其地主家庭修“花明楼”

江麓机械厂党委：

我记得1960年时，贵厂支持农业成绩很大。但是其中有一部份是值得研究的。比如说，有人唆使一些坏东西，另搞什么花明楼，架子大，气势汹汹，硬拿强要马达、水泵、钢材之类，……供地主阶级祖宗搞什么“光宗耀祖”之类的低级趣味。这是很值得追查的。……

§ 1964年10月7日给湘潭市公安局的信

湘潭市公安局王局长等同志们：

毛主席是我们最热爱的领袖，也是世界人民最爱戴的无产阶级导师之一。我记得解放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五位无产阶级导师的像片并排挂的，后来不知为什么只剩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四位导师的象并排挂了。我很奇怪一九六二年正当赫鲁晓夫与帝国主义等反华大合唱的时候，有人在一本很“著名”的书内，又用笔砍掉了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此人胆子真不小呀！为此事，我急疯了！

中国共产党员 陈剑鸣 一九六四．十．七夜

§ 1964年10月9日给湘潭县委信，再次揭发刘少奇为其地主家庭修“猪楼”事（信封上有“特急”二字）

中共湘潭县委：

我们知道，有人以皇帝的派头，大建什么猪楼，到湘潭全民所有制工厂横行无忌，侵占工人阶级创造的财产，实际上就是对劳动人民犯下了罪行。……

俗语说：擒贼要擒王，打蛇要打七寸。这些看法如无不当，请你们准备一下材料，掌握敌人的罪证、证明人、找出真正的为首分子，不管他的官有多大，都不要怕。我相信六亿神州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群众的天下，什么鬼都是不可怕的。不管它如何诡计多端，我们也采用“三打白骨精”的精神，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无声的命令，统一思想，将旧世界杀个落花流水，必获全胜！

§ 1964年10月13日夜给林彪同志信

林彪元帅同志：

我有一个事情向您反映一下，近期《解放战争回忆录》见《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这一文章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期间，有人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挟天子以令诸侯”，主持把南方的一些部队调驻北方，这样即可巩固北京的解放区；又可使这些部队在内战一旦发生后，不致孤悬敌后，被人吃掉；同时对谈判也有好处。云云。我仔细想过此问题，认为与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实质是与蒋介石遥相呼应，摧残有生力量，布置一次围剿，使伟大的工农红军集结一处，便于在半路拦截，暴露我游击队目标。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我认为：全国都是工农革命人民的天下，游击队应当在这些地方扎下根子，与群众有如鱼水关系，不断壮大，

迎接主力红军的到来，长期隐蔽，待机破敌。

我觉得琼崖纵队孤悬敌后23年，红旗不倒，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安徽、江苏游击队也坚持得很好。但是有些却复没了，如洪湖赤卫队，……有些被敌人破坏，如新四军等。这些事情决不是偶然的。现在东风绝对地压倒西风，我建议中央军委和您是否能听取这个意见，派人专题调查研究一下这些事件的真相，则无产阶级事业幸甚。

我认真看过您的书，知道您对于党和毛主席的事业是忠诚的。我祝您身体健康。顺致布尔什维克式的敬礼！

同志 陈剑鸣 1964.10.13夜 湘潭市人委

§ 1964年10月19日给他的女朋友的信

……现在，领导正在追查我，说我是混进革命阵营里的反革命分子，所以我害怕得很，病又复发了。

§ 1964年10月26日给他的女朋友的信

小×同志：

……我神经病又发作了，最近以来，我写了很多信件发到中央和各地。追查起来，我是犯错误的。我一定承认错误，但以后还会处处犯类似这样的错误，除非我的生命停止了跳动。我知道这样作的后果是什么，但是我决定坚决地做下去，直至有人打击我为止，再和他说道理。……

§ 1964年12月2日给妹妹的信

××妹：

看到你的来信，我认为你在革命的熔炉里锻炼得更纯了。党和毛主席太阳一般的光辉，赋予每个革命青年新的生命……

但是，我又被当作一个疯子，早几天送到湖南医学院和省精神病院看病，估计又要住两个月，……我厌倦医院那种生活，希望作一个健康的自由人，生活在太阳照耀下的大地上。……

§ 1965年10月31日给母亲的信

母亲：

一月十五日我被逮捕了，关在北京×××看守所，审讯记录写了半尺高。这件事我感到惊奇和可怕。但我相信党和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对我的问题的处理是不会错的，希望母亲不要大惊小怪。……如果母亲找到组织连系，也不要过于激动，客观地说明情况就可以了。祝

安好

儿里宁上 65.10.31

§ 1966年9月19日给妹妹的信

××妹妹：

……我相信在党和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一小撮牛鬼蛇神的捣乱，只不过是“蚍蜉撼树谈何容易”罢了，它们的灭亡是必然的。党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哥哥 里宁绝笔 66.9.19

§ 1966年11月23日给母亲的信

母亲：

……此外，请母亲写信给中共湘潭市委政治部或湘潭市人委组织上，请求他们营救我出狱。万一我有不幸，也请母亲弟妹放宽心怀，因为人总是要死的，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死，也是义不容辞的，希望母亲不要忧伤，好好保养身体。希望母亲和弟妹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老三篇，把心怀放开一些。我于十月二十九日到红卫医院，现在感到好多了。

儿里宁 上 一九六六、十一、二三于北京红卫医院

§ 1966年12月1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现在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我这个失去自由的人，情不自禁地高兴得跳起来，我虽然没有参加运动，但我对文化革命有关消息感到十分亲切！内心里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在北京时间内，有关当局（不明身份）曾经对我审讯了七个月，我尽可能把一切想法和问题，向政府有关当局作了彻底交待。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说我是反革命、阶级异己份子等等，扣了一些帽子，使我感到惊奇。在看守所，我看不到报纸，直至今年五月才如愿以偿。我一直坚持“党是不会冤枉人的。……”（下略对刘少奇的揭露和批判）

……我对以上问题一直找不到答案。如果我错了，又错在什么地方？我承认我水平很低没有社会经验，我怀疑了一个庞然大物——刘少奇。但是矛盾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既有明显的矛盾，我有权利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名义，理解这些矛盾。头可断，血可流，都在所不辞。问题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死不瞑目。

敬爱的首长，由于我失去了自由，我一无所有，我连信纸都是千方百计借来的，有信封了，又没有钱买邮票……。

最后，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内心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陈里宁 于红卫医院四病区1966年12月1日

§ 1966年12月14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我回忆我所作所为，主要是对刘少奇有了怀疑，发现他的《八大政治报告》、《论共产党员修养》、《在1959年军委扩大会的讲话》，有许多问题自己解决不了，一共有五十多个问题，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可能没有收到。我对刘少奇有怀疑的地方，例如：八大报告中一开头说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富农、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与毛主席思想相违背的。在1959年军委扩大会上，他说他过去搞毛主席个人崇拜，现在搞邓小平个人崇拜，这是谩骂毛主席。他还说掌握党的政策要象开飞机到莫斯科一样左一下右一下，才能到目的地……。

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我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怀疑刘少奇，并不等于就是反党。最近从红卫兵传抄的材料中，我看到聂元梓等十一人写的大字报以及其他材料，说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二号人物，而刘少奇则是一号人物。他们并没有犯法，而我却犯了法，使我十分惊奇……。致以

最崇高的敬礼！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里宁于红卫医院 1966.12.14

◇ 第三部份：赤胆红心永远忠于毛主席——陈里宁狱中言行（狱中看守人员所记）

1965年2月9日

犯人（指陈里宁，下同）用小棍在草纸上刺下了动人的词句。他刺道：“妈党：儿1月17日到北京，2月9日 永别了。您万岁！里宁”

1965年2月11日

犯人自言自语说：“毛主席，救救我！”

下午，犯人被提出受审讯之后，搜出犯人用手指甲在上面刻着字的肥皂，上刻着：“毛主席万岁！妈，永别了！共产党万岁！共产党员 陈里宁 1965.2.11”

1965年2月21日

“不知你们怎么搞的，把我当成了反革命，当成了叛徒。我没犯错误，我是一个红色革命干部……。”

1965年2月22日

犯人用草根在手纸上刺小洞，让小洞排成字名：“毛主席：永别了，我无罪，祝您万岁！”

1965年2月23日

犯人向看守人员要毛选，要雷锋日记，要报纸，说要进一步学习政治。还说：“他们就是不

给。”犯人提出去审讯后，在床上搜出了他用草在脏手纸上刺的五张字：“妈，儿已被杀！勿悲伤，祝安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陈里宁！还有后来人！”

下午五时，犯人大哭：“妈，我没罪，人家犯法我倒霉。”“看守，什么时候枪毙我？死时我写个字条送妈妈。”

1965年2月27日

犯人在观察孔的玻璃上哈气，不让看守人员看见。并且高唱：《学习雷锋》、《洪湖水》、《红色娘子军》……等歌曲。

1965年3月4日

“同志，你太辛苦了。我给你唱《白毛女》的歌。”说后就歌唱。

1965年3月17日

中午，用小草根在手纸上刺大字：“天涯何处觅真理？”

下午被审讯回来，又大唱《娘子军歌》。

1965年3月18日

“我都快死了，给我一本书看看吧！”

并举起了拳头，呼“我要为真理作斗争！”

1965年3月25日

犯人提审完回到住室后自言自语说：我要去看天安门！我要跟着共产党走，走毛主席的路。你们把我关在这里，我跑也跑不了，你们把我放了吧，我死也死个光荣呀！我要看看毛主席，看看天安门。说后就对着看守人员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1965年3月29日

“我只骂了皇帝一句，你们就要把我杀掉了。”

1965年4月5日

犯人说：把我烧成灰也找不出反革命的影子来！

1965年4月×日

“我光吃饭不干活，这不是成了二流子吗？叫我劳动改造吧。”

他还对看守人员说：我要交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检举一个大反革命，就是我死了也要检举清楚。



1965年4月15日

今天仍然对看守人员说：我不是国民党反革命。国民党时我还是一个小毛孩子。共产党要杀国民党和反革命的脑袋，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害怕。

1965年4月20日

犯人问：“你把我关在这里干什么呀，把我养肥了杀肉吃吗？……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把我抓错了。”

1965年4月×日

犯人自言自语：可惜呀我没有长上翅膀呀，如果我有翅膀，早就飞跑了。接着又问看守人员：这里离北京市有多远呢？不知道有没有公共汽车？

1965年5月1日

犯人坐在床上说：今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算了一算，是国际劳动节。

犯人被审讯回来后，对看守人员说：那位穿呢子制服的审讯首长说我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贩卖私货。我没有披过马克思的外衣，我披的是破棉衣。……法官还说我是贩卖私货，我检查了一天也没检查出来，我连一分钱都没有怎么贩卖私货呀。

我没有披马克思的外衣，县里的一个书记披过马克思的外衣。他报告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三面红旗。反而把我给抓来，没有抓他，叫我当替死鬼。

赫鲁晓夫披过马克思的外衣……。

1965年5月10日

上午犯人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呀，我要去给农业社干活，在这里没有什么意思。……你们干吗不给我书看呢？”

1965年5月19日

“他反对毛主席为什么不杀他的脑袋呀？我不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杀我的脑袋呀？不行，我得找个地方去讲理。”

“难道我相信马克思、列宁的话我就反动吗？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教，我不信天主教和蒋介石的鸡巴教，我就反动吗？我思想搞不通。”

1965年5月22日

犯人在地下走着说个不停：“审讯我的首长说我的脑袋中毒太深，要我消消毒……那个老头子可厉害了，我斗不过他，咱一个跟头打十万八千里还是出不了他的手心。”

1965年6月9日

犯人自言自语：那个鸡巴毛把我关在这里，我犯了什么错误，要杀我的脑袋。

我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你就把我抓起来不放。抓我的人是坏家伙，我出去以后非要枪毙他不可！为什么随便把一个共产党员抓起来？真他妈的不讲理。

1965年6月22日

犯人用手纸叠了一只鸽子，并和它说话：“我骂了皇帝，骂皇帝是要杀头的呀。……反革命分子真厉害，想作皇帝。”

附：看守所人员对“密捕”陈里宁以后的情况的报告二则：

（一）×××同志：

逮捕陈的保密工作，想继续下去很困难，×××意见是否可通知××，公开向其家属宣布陈已依法逮捕。

××× 1965。4。16

（二）……陈母找陈犯，她怀疑，着急，据她自己说，她急的有些疯疯癫癫。……四月二日，陈母借了五块钱，到了××落脚，并去了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的一妇女同志×××拿了陈里宁调动工作通知的存根给她看，说是已被省人事局调走。四月五日，陈母去省人事局寻找，人事局的两个女同志答复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现在，陈母的态度是：认为不该瞒着她，她说：“……就是犯了什么事情，只要告诉我一下，也没问题。有什么问题，就办到那里，我也不会有什么顾虑。即或犯了错误，他也不是当权派，我想也没有蛮大的错误犯啊！……我的崽女都是政府养大的。……我若不是想得宽，看着几个细伢子遭孽（湖南话：可怜），就死了……”

1965年4月×日

◇ 第四部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们，你们才有精神病！——陈里宁“病历”及他自己在病院中所写的“病情小结”

一、湖南省精神病院大夫所写的陈里宁“病历”二则：

1963年12月×日

……病人对刘主席有十多点怀疑：

（一）刘主席所写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和《论党内斗争》违背了《矛盾论》和《实践论》。

（二）与普列汉诺夫亲密一家、拥抱。

(三) 带爱人出国游马路游山玩水。

(四) 刘主席当权以来，不是过左，就是过右，刘主席的主张象开汽车一样，一左一右。

(五) 疑刘主席的爱人是特务。

(六) 刘主席发表的反修文章观点不对，很勉强。

(七) 刘主席工作不深入基层。

(八) 刘主席访问越南后多了一个万岁“刘主席万岁”。……

病人还说要到省委去证明他不是疯子。

……因此又送来住院，胸部透视无异常发现，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态清晰……。

1964年11月7日

……九月下旬，忽然又大写文章，谩骂刘主席，说刘主席《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中有五十多处不正确的地方。说刘主席的观点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受鉴定人陈里宁生活上一直表现尚正常，仪态整洁，表情自然，意识清楚，定向力、理解判断力、记忆力，相当好。

受鉴定人自己感到几年来变得特别喜欢思考问题，看了毛主席著作，就用毛主席思想来看别人的问题，所以发现刘主席的书有50多处错误……。

谈到自己别名叫陈剑鸣时，说要使他变成毛主席手中的宝剑……。

结论：

(1) 此员精神病复发，其所以出现反动言论，乃是原来反动思想在精神病症状上的反映。

(2) 诊断：仍为精神分裂症。

医生×××(签字) 1964.11.7

## 二、北京红卫医院大夫及护士所写的陈里宁“病历”

1965年8月16日

……伴诊×同志述：目前病人正在京×××受审讯，因病，影响审讯。已和我院联系，先住院治疗，病情好转后，继续审讯。

查体：一般情况佳。

精神状态：意识清醒，接触良好，对答切题……。但无自知力，不知道自己为何在×××

被审。

印象：精神分裂症（妄想型）。

×××（签字）

1965年8月18日

说话滔滔不绝，语流快，未听有破裂性思维。被动接触良好，能回答护士提出的一切问题，能将自己家庭历史详细叙述。

.....

大量地看报，而且是过期的报纸。

问你有什么病，说有时给毛主席写信，想见毛主席。

中班×××

1965年8月19日

病人自述“我最恨尼赫鲁、肯尼迪、赫鲁晓夫，我恨死他们，要揍他们。”

观察病人情态仍是活跃，说话时表情丰富，形像，动作神神彩彩，内容丰富，语流快，常常引来许多人围着病人。常常把自己经历和家庭历史毫无保留地滔滔不绝告诉给病友和护士，常常向病友讲解天文、地理等知识，被动接触良好，对护理合作，大部份时间，专心地看报，甚至一口气能看三、四小时。

早班×××

病人夜里睡眠好，早起料理生活好，在床上阅读毛选《为人民服务》，自述昨晚吃了药夜里睡得好，脑子什么问题都不想了，表现愉快。

夜班×××

1965年8月25日

病人上午很兴奋，自己滔滔不绝地向别人述说自己的看法：“刘少奇是地主出身，在家盖自己的房子是光宗耀祖，没有阶级观点，曾经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出二十个问题，他们不解答，说我是右派，没关系，我坚持原则，向毛主席写信告他们。”说时感情很激动，比手划脚。

早班×××

1965年10月15日

患者夜间睡得好，晨起主动地帮助工作人员进行劳动，能积极地参加集体活动。生活饮食均好，未见异常情况。

夜班×××

1965年10月29日

病人仍无自知力，不知道自己得了精神病。

1965年12月24日

患者积极参加病区娱乐活动，协助工作人员劳动打扫卫生等，有时独自看书看报，今日问护士：“我什么时候能出院？病基本上完全好了，我在医院一定安心养病，出去好工作。”病人主动接触好。

早班×××

### 三、陈里宁在红卫医院亲手所写的“病历”二篇

（另一篇未知何时何地所写，好像是“口供”记录）

1965年11月11日

“我在湘潭和北京发病的原因都差不多，……我害怕刘主席反对毛主席。我疑心刘主席的原因有如下一些：

1．1950年刘主席作土地改革报告，说地主三年可以改变成份。这个说法是不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很明显是一种阶级斗争熄灭论。

2．1956年他说：地主阶级消灭了，富农快消灭，资产阶级正消灭。这很明显是种修正主义。1962年中央农村工作双十条说明地主阶级存在，并没有消灭。经济上改变了，政治思想上没改变，不能算阶级消灭。列宁说：要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消灭阶级社会带来的一切痕迹，才能算消灭阶级。

3．刘主席在1959年军委扩大会上说：我过去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在搞林彪、×××人的个人崇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党和毛主席从来就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提高领袖的威信与个人崇拜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拥护毛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正确，并不要别人去搞个人崇拜。

4．毛主席一贯主张掌握党的政策要反右防“左”，坚持正确的路线政策。可是刘主席1959年说：掌握党的政策要左一下，右一下，象开汽车、飞机一样。我认为这是对党的政策开玩笑。

5．刘主席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上修掉了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1962……正当赫鲁晓夫反华之时，这是不是相呼应？如此等等还有许许多多，我在×××看守所交代过了。这些矛盾我提出来，总是遇到批判，我不相信我的眼睛了。我害怕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就会与蒋介石呼应，人头滚滚。

6．1960年湘潭市都说刘主席故居要修花明楼。党委书记不通过手续，跑到湘潭市×

××厂要马达、电线、木材、水泥。刘主席家是地主，房子本来就比农民好，再修好让别人参观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算不算背叛地主阶级？

陈里宁 1965年11月10—11日写

1965年11月19日

“现在我感到自己的病情好转，……

对刘主席的看法问题：

……我把刘主席的文章《论共产党员修养》、《八大报告》、《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等与毛泽东选集对照，这时我看问题不同了，把《论共产党员修养》烧掉了。1964年后，我更发展到写信给毛主席，说刘主席与毛主席唱对台戏。

……我认识到：我们党有毛主席领导，党的团结有如钢铁一般，……。

54床 陈里宁”

196×年×月×日

一、1963年11月，市人委把我抓到长沙湖南精神病院，正在等床位，我向湖南省委张平化书记交了一大包信，信是我找到省委交给传达室，其中包括毛主席和张鼎丞检察长、谢觉哉院长的信。

二、1964年9月向政治局、毛主席写信一包，寄去的。里面攻击刘主席及××书记、××书记等（地方的）领导。攻击刘主席已花甲，怎么又结婚，访问四国没有宣传马列主义。

三、1964年10月向湘潭市公安局王局长写信，建议查清为什么马恩列斯毛主席的象解放初放在一起，后来又分开挂。此信由市人委传达室转去。

四、1964年10月向湘潭县委写信，又提起五风为什么这么严重，要查清原因。

五、1964年10月向宁乡县委写信，攻击刘主席是地主，为什么要修花明楼。是什么人到湘潭大厂子搞材料去用？

六、1964年10月向康生等同志写信，攻击刘主席不好。

七、1964年10月向湖南省委社教团写信，诬蔑刘主席和××书记，××书记（地方的领导，与本项第二条同）搞私人关系。

◇ 第五部份：砸烂刘邓反革命专政，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陈里宁和金大夫在“红卫医院控拆刘邓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

1965年1月10日

§ 陈里宁发言：

敬爱的同志们——敬爱的红卫兵战士们！

你们好！

我能够参加这样一个会议，我真是高兴极了，我的心好像是要跳出来！一月七日下午，中央首长王力、戚本禹同志接见红卫兵并向我宣布“你自由啦！”我真是高兴得要跳起来！我禁不住要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毛主席和党救了我！是革命群众救了我！是亲爱的红卫兵战士们救了我！我内心里说不尽的感激！没有这些，我早就完了。

下面我把我近几年的遭遇，向大家作一个汇报！

事情是这样的，我叫陈里宁，在湘潭市人委办公室工作，一九五四年入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对刘少奇产生了怀疑。刘少奇一九五六年在八大会议上大手遮天地作了一个政治报告，说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富农……。我把这个论点与列宁、毛主席著作对照，认识到刘少奇的论点是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从来教导我们，改变了所有制，我国政治思想体制谁胜谁负的问题，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列宁同志教导我们：什么叫消灭阶级呢？就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消灭旧社会带来的一切痕迹（列宁文选两卷本第二卷）。为什么刘少奇反对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呢？这条阶级斗争的红线促使我对刘少奇产生了更多的怀疑，并成天推敲不已。到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上说：“我过去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在不搞了，我要搞邓小平个人崇拜……”又说：“掌握党的政策，就是要左一下右一下，象开飞机到莫斯科一样，才能达到目的。……这使我更怀疑了，我与其他同志陈中虎、陈泽声等作过争论并老是琢磨这个问题。到一九六二年，我又重新对照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发现修改本把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勾掉了，并很少很少提毛主席的教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沿着这个线索，带着刘少奇的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使我对刘少奇的幻想消灭了，于是在一九六二年独自钻研推敲刘少奇著作，共发现五十多个论点值得怀疑，于是我在个人的笔记上记下了这样一些问题，可是我因公外出，有人爬窗进来，偷看了我床枕头上的这本笔记本。一九六三年四月份，我写了一份材料交给李力秘书长，他诬我精神病，把我送入湖南省精神病院。回机关后，我又琢磨那些问题。在一九六三年十月，我忍不住就写了信给毛主席谈到了我的怀疑。不久我又被送入精神病院，出院后我继续琢磨那些问题，但湘潭人委办党支部开大会批判我。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伟大精神鼓舞下，从恐惧到无畏产生了一个飞跃，我忍不住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不怕死，利用时间，写了三十多封信扩大影响，并把我的一切行李拿回家，准备不怕死大斗一场，我认为修正主义也只不过是纸老虎。接着住入精神病院。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有三个人把我从医院秘密逮捕到北京，非法审讯七个月之久，扣上了“现行反革命”、“民族败类”、“叛徒”、“阶级异己分子”、“黑帮”，不准写信，不准说话，挨打受骂，威胁，用墩布棒子打我，把臭袜子放入我口内，夏天光脚走水泥地，并准备把我用绳子吊到窗户栏杆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害人呀！我也针锋相对地作了斗争，如想办法找住院红卫兵，与外界联系等。

我听到外界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后，心中高兴极了，毛主席真是英明呀！我总是想法找红卫兵。幸亏第七次住院金大夫冒着极大的风险，帮我与红卫兵联系上了，把给中央文革的信寄去了。我还想通过同乡周齐明弟弟探亲，把给中央文革的另一封信发出去，后来信被扣。有曲折有反复，但我想到了毛主席教导，相信党，相信群众，我就什么也不怕了。毛主席说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从毛著中找到鼓舞，支持，力量，克服私心杂念。认识到光有敢字还不够，还要有一个善字，从毛著中找到聪明和智慧。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是力量，使我

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掌握了万能武器。我虽然能力有限，但体会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经过这场斗争，我接受了党对我的初步考验。我准备同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去迎接新的考验。对我本人来说，今后更要加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我的缺点和错误还是相当多的，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我充满信心，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什么也不怕。现在看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不过是纸老虎！我完全相信自己可以克服缺点和错误，背叛我的家庭。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但是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前途。我要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永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上刀山入火海也甘心情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怕任何艰险，就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坚决同刘邓反动路线斗争到底！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金弘敏大夫的发言：

同志们：

今天在这里开这样的大会，由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直接受害者来控诉，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过去精神病人一旦被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就是永世不得翻身，说话没人信，办事不可靠，政治上低人一等。而今天，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方向，过去被认为“疯子”受政治迫害的人也和我们一块起来造反了。我们坚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把资产阶级的精神病院砸个稀巴烂！

同志们，陈里宁同志第四次住我院由我来主管，在和陈里宁同志接触时，我认为他是一个革命同志，是一个革命意志坚强的同志，他经受了考验和锻炼。陈里宁同志才只三十一岁，曾先后七次住湖南精神病院和我们医院。本次入院是十月二十九日。病历记录着现在职务是政治犯，由看守所送来，主诉是吃屎、喝尿。面对这样的“病人”，我仔细翻阅了既往病历，发现陈里宁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出于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决心，而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对刘少奇之流产生怀疑，对刘少奇的一系列问题做了系统分析研究，并做了严肃的、非常正确的批判，并于一九六二年开始就有关问题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但是，以刘邓为首的反动路线的黑线，对陈里宁进行了政治迫害，从精神病院中秘密逮捕到京，长期住看守所，进行多次审讯、逼供，遭到了生活上的虐待和政治上的迫害，不许看报纸，不许读毛选，过着与人世完全隔绝的监狱生活。后经陈里宁同志的绝食斗争，才给一本《论人民民主专政》看。了解了以上情况后，感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精神病院的大夫不应无视政治，首先必须对每一个精神病人政治上负责任。毛主席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想，精神病本身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一门科学，一个临床工作者头脑缺乏政治，就会犯错误，就会使革命同志受迫害，使坏人受保护，因此我决心接受主席教导：“周密仔细地思考”，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应盲从”。尽管陈里宁同志每次住院都受到限制，不能写信，不能自由活动，而且病人多次提醒我：“金大夫对我这样，不怕受连累吗？因为我是政治犯人。”但我还是主动给病人寄出去几封信，使病人两年多来第一次和家中亲人取得了联系，和其他病人享有同样待遇，可看电影等等。以后，我又感到，应进一步仔细周密思考，我发现病人最后两次住我院时间只隔一个月，为什么这么快又犯病了？而且为什么病人入院后马上一切在看守所的精神症状全部消失了呢？更值得怀疑的是，为什么每次入院的原因都是吃屎喝尿？一系列问题使我决定不能再做前几次诊断的奴隶了，中国的精神病工作者要做中国精神病学的主



人，而不能做苏修、英美精神病学的奴隶。在苏联，反对赫鲁晓夫的人被送到精神病院，而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把怀疑刘少奇的同志打成“反革命”关在监狱、精神病院里，能容忍这一切吗？绝不能！精神病学要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后由于革命师生的革命造反精神，及中央文革首长的支持和关怀，终于给陈里宁同志彻底平反，陈里宁同志获得了自由。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给的。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

类似这种事例还很多，应使我们每一个临床工作者深思了，要从自己的工作中看到政治，不能再埋头于业务和大病历的书写中了。陈里宁同志曾对我说过：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们大夫只能管治病，但管不了政治。同志们，陈里宁同志对我们提出如此尖锐的批评，一针见血地击中了我们的要害，这不仅仅是陈里宁一位同志的批评，也是多少阶级兄弟对我们的严肃批评！过去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一部份充当了刘、邓反动黑线的工具，陷害了革命同志，保护了坏人，但是毛主席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确应猛醒了，我们也要起来造反，清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在以前工作中大夫也诊断错、治错了病人；但是这一切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责，责任应由他们来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冲垮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安定医院并不安定，里边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最近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同来我院，建议我院成立一个调查小组，要求我们用清醒的政治头脑去审查与政治有关的病历，对被反动路线摧残、折磨的精神病的同志不单治好病，也要从政治上帮助他，从政治上关心他。

同志们，这是首长对我们的期望和信任，但是要真正搞好，必须依靠广大革命群众，依靠革命医生、护士、工人等同志，一块大揭发，彻底批判，将资产阶级反动东西彻底砸烂，肃清刘、邓路线恶劣影响。我们还要到全国精神病院点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同志们，让我们一块造资产阶级的反吧！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

【往事追忆】

红卫兵小报和我（十）

• 周孜仁 •

（续上期）

事实上，让我们感到不是滋味还不止这些。比如，当时革联会老要我们把辛易之“解放”出来，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参加“新生红色政权”，实际上，这当然是警备区军官们的意见。从理论上讲，中央对夺权的要求就有一条：必须实行军队、革命群众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砸派攻击革联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8 1 5 学生单方面夺权”，虽然后来军队马上介入，而且态度鲜明地支持8 1 5，军队算是有了，但“革命干部”一席始终空缺。当时是有一个革命干部：段大明，一直站在8 1 5一边，但仅仅副市长一个，级别太低。根据重大8 1 5的意见，

原本是想直接让鲁大东出面参政。任白戈下台后，重庆的一、二把手实际上就是鲁和辛，二人还是儿女亲家。问题是从8 1 5开始，和重大打交道的一直就是辛，鲁一直在幕后。辛在该校学生中积怨甚多，易于感情用事的学生对他的复出自然十分反感。可警备区偏偏要辛出面，我和许多当事人探讨过，都不知个中原由？投桃报李是中国人传统美德，军人这样卖力支持8 1 5，你8 1 5这点面子总要给吧？军队通过总团勤务员作了许多工作，同学们虽然勉强答应了行、同意，但总很勉强。有一个例子：2月27日下午，由革联会领导下，由市委、市人委、市文革机关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大礼堂召开斗争鲁大东大会，五千人参加。除了群众代表发言批判外，谁都知道，今天的压轴戏是让辛易之出面揭发、批斗鲁大东以“火线亮相”。多有抵触情绪的重大8 1 5学生也热热闹闹参会。会中有口号云：“辛易之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革命不分先后”等，大家也跟着喊。回校后谈起，一个个都心里添堵，感觉别扭得不行。会毕，鲁被押回重大学生七宿舍监护地，甫出汽车，鲁匍匐坐地，作小儿哭天状，口中大呼冤枉，称：不是辛受鲁蒙蔽，而是鲁受辛蒙蔽云。

为了做工作，《山城战报》全力开动。3月28日出版的《山城战报》第五期，从文中内容看，应当有六个版面，但笔者仅存四版。仅从四个版面来看，关于解放辛易之的就整整两版。现将标题实录如下：消息：“揭发批判辛易之的大会在重大‘八一五广场’举行” / “欢迎辛易之和我们并肩战斗——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代表黄顺义在三月二十三日批判辛易之大会的发言” / “贫下中农社员谈辛易之（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冶五三战斗组）” / “为什么辛易之可以参加革命的‘三结合’”（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要武》战斗队、《二七》战斗队、《红旗》战斗队） / “欢迎辛易之参加革命的‘三结合’”（重庆八一五机械兵团川江电机兵团） / “我们所了解的辛易之”（市革联会市党校红色革命造反兵团）

实事求是地说，以上这些文章，也并非全在言不由衷地为辛歌功颂德。如黄顺义的发言，语气还是相当尖刻的，完全像在训斥一个在外面闯了大祸的三岁孩童。现在我倒在揣想：一个在戎马倥偬和政坛沉浮中摔打了半辈子的官员，将自己的尊严完全搁置一边，仅为了重获政坛上的一席官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一群娃娃声色俱厉的申斥，这时候他该是何种心情？人哪，为了自己在群体中的某种位置或者某种利益，会表演得多么可笑！多么可悲！

但是辛易之没有想到、竭力支持他的5 4军军人没有想到，甚至扭扭捏捏拉扯他的重大8 1 5也没有想到，他的复出已经不可能了。既然他已经和八一五有过这样的蜜月，那么不久后平反复出的砸派理所当然就把他看成了自己的死敌。既然他已经成为了两派最具有争议的人物，那么在重庆的政治宴席上，要让他坐在“革命干部”的椅子上就不合适了。老百姓有句俗话：“久等吃好席”，在这儿倒刚好用得着。一年后，成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坐在“革命干部”席位上的，竟然是两派都一致要打倒的鲁大东。政治棋局上的博弈规则就是这么奇怪。

1967年乍暖还寒的三月下旬，重庆已经听到了有关“二月逆流”一说，预感到上面有谁又出了什么问题。就在意图“解放”辛易之的同一期《山城战报》，在第二版，刊登了“本报观察员”文章：“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同时配发消息：“死灰在复燃 / 保皇四军言行录”，而且，同时很抢眼地摘要刊登了一直被8 1 5嗤之以鼻的“救世主”，首都三司头目蒯大富的讲话：“迎接第八个回合的大决战”，还有北京大学因“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发家的聂元梓的讲话：“警惕阶级敌人的新反扑”。被胜利弄得晕晕乎乎的8 1 5，现在感到御林军的份量了。你“孙大圣”上天入地，能跳出毛的手心吗？他们所有的命运实际上都在被北京牵着鼻子走。

下面是我的日记：

“从戚本禹同志的一个讲话中，我们意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全国各地出现

了。这股逆流的代表人物，就是在农林口搞反攻倒算的谭震林。

“王力同志讲：四川整个地翻过来了。

“北京来信节节传来，称：北京舆论一边倒，说重庆也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而革联会正是这股逆流的产物，罗广斌是革命烈士，红代会发表声明，支持西师，大骂重大 8 1 5 是叛徒集团。

“据传周总理 3 · 3 1 讲话，说重大 8 1 5 变了……

“一场巨大的风暴又在重大酝酿起来，从同志们激烈的神情里，从同志们按捺不住胸中的气闷而爆发出来的歌声中，从辩论会上慷慨的发言中，从满地的大标语中，又可以听到 8 1 5 春雷前的风音雨响，而且，同志们越来越意识到：问题出在军队。

“有人写大标语：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这段文字紧记在 3 月 1 7 日和 4 月 1 日的日记之间，没有具体标出时间，记得很随意。使我无法回忆起上面所说的发言慷慨的辩论会、满地的大标语，特别那一条“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大标语，具体是怎么发生的？何时发生的？有些什么细节？同学们有些什么不满和困惑？但这一点是很明白的：作为 8 1 5 派事实上政治中心，重庆大学再度动荡不安了。从校园，到每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学生。1 9 6 6 年 8 月那一次，压力很大，但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是站在毛一边的，而这一回不同了：他们不清楚自己的位置。搞不好，他们很可能就会和刚刚被他们打垮的“思想兵”一样，主观上想保卫毛，实际上却走到事情的反面：这一点，使他们恐惧万分。

4 月 1 日出版的《山城战报》第六期，正式刊登文章，开始“炮轰谭震林，粉碎新反扑”。这个有些滞后的信息向重庆人证实了：在北京，以 2 月 1 6 日大闹怀仁堂为标志的军人造反，已经被老谋深算的毛轻而易举地彻底击败。可敬的老元帅老将军们，他们跟着毛泽东戎马一生，对于这一次了不起的、悲壮的、关乎民族和国家命运的行动却显得过于莽撞。他们对毛的性格应该了解呢，可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像不懂事的孩子耍脾气似的举动呢？

大闹怀仁堂的故事当时大家还不可能知道。但俗话说：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北京的斗争，势必紧紧牵连着千家万户普通老百姓的命运了。文化革命，注定开始新一轮的灾难。

重庆革联会的机关报《山城战报》，当然得跟着起哄，虽然自己都有点稀里糊涂。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一回，他们实际上是在向自己开炮。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吕青（加拿大）

《CND》总编：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